



杨复冬的早期杂文

◎祝淳翔

去年12月初,我接待了一位上年纪的女读者,她来查作家钟子芒10岁时刊在《小朋友》上的“处女”诗作《“小朋友”十岁,我也十岁》。诗后来查到的,内容差相仿佛,标题题起得拗口,叫作《结同年友》。出于好奇问为何要查,这才知道她是钟先生长女杨慧。

记得几年前当我编辑董鼎山晚年文集之时,多次在董先生文章里见到钟子芒的名字,他本名杨复冬,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哪知多年后能与他后代结识,也算机缘巧合。等关系逐渐熟络,杨女士带给我其父生前的稿件资料,其中包括三册1975年记至1978年去世前夕的日记本,说让我闲时翻翻。我则“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将其录到电脑里,就此窥见一位知识分子在那段非常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中还提及作品的构思过程,挺有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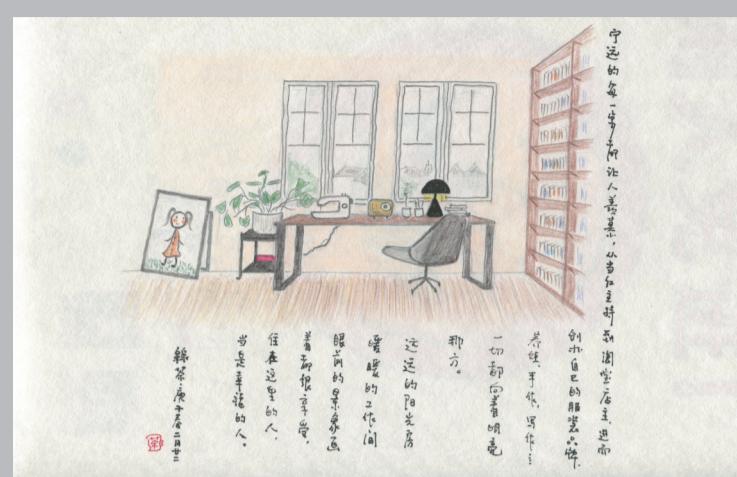
由于日记尚未录全,这里不妨先卖个关子,略微回溯杨先生早期的笔耕事业。不求全面掌握,至少作一管窥,看看他当年语言与思想的锋利程度。

1943年3月8日起,杨先生以“焉用牛”笔名在《东方日报》第4版主持“艺文坛”副刊,如在《木刻与文章》里,指出“写文章也得像木刻一样,一刀一画,不但要非常精细,同时要非常有力地执行,那么,才成一篇好文章、好的作品”。《交游》文中,他讽刺道:“一个文人窗下十年,那还不如每天挟了半页诗篇,坐在咖啡馆,每天吃一客三明治为宜,交游交游。”又如《儿童文学》,对于前辈颇有微词:“儿童文学是文学中的冷门货,新的儿童文学家写了文章,只好塞塞字纸篓,因为市场上没有一本儿童读物可以发表,而同时也会为老板所拒绝。拒绝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生意眼,一些老的作家,如吕伯攸先生之流,则也放弃了这儿童文学,写些无聊的文章了。”甚至如《忆旧》,令人警醒:“现在文稿上有一个风气,便是不少自觉是‘文坛前辈’的人,都写起忆旧之类的文章,或是自己从前的历史,或是与某名文人交游的经历,既可卖老,尚可捞稿费,何乐不为!”打击面不可谓不广了。

1945年11月,杨氏将几年来作的九十来篇文章收入杂文集《芒刺》,正文起首引述鲁迅《两地书》里对于青年的失望语,可见他自居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令人感佩。正如陈青生在《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里的评述,杨复冬的“杂文以评议社会政治问题为主,又广涉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捕捉和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特别迅速,往往一事一议,篇幅短小,语言晓畅,观点鲜明,讽刺犀利,有些作品还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形象描绘”。所言恰如其分。

绿茶画名家书房·宁远

写作者、前媒体人。



宁远书房 宁远所走的每一步都让人羡慕,从当红主播到淘宝店主,进而创办自己的服装品牌,养娃、手作、写作……一切都向着明亮那方。



地缘看三国:

地理如何影响历史选择
温骏轩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以地缘视角剖析地理如何影响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时揭示那些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地理因素。该书配有彩色地图集,帮助读者直观地了解三国时代的地形地貌,从而加深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

王水照著
中华书局

作者以毕生研究苏东坡的丰厚学识和独到心得面向大众,从综论十题、苏海拾贝、东坡诗词讲解、苏文简释四个部分全景解读苏东坡其人、其文、其思想,才思和艺术并有,学术和可读兼具。

印象里的中国:

韩天衡著
中华书局

韩天衡先生这本新作分印篆源流、行知合一、印人印事三个板块,全面呈现作者在中国印篆研究上取得的非凡成就。随文配有400余方古代珍贵印人印作、豆庐藏印及豆庐所治印等,以及印谱书影、印材等图片共600余幅。

在江南遇见二十四节气:

沈卫林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从一个普通江南人的角度,详细讲述了地处江南之地的桐乡在每一个节气时的风貌,通过大量唯美、写实的照片和朴实、准确的文字,展示了二十四节气中江南的生活日常,读之如徜徉在江南水乡之中。



秋末的花

◎遭苦盦

读到了松尾芭蕉的“深秋矣,邻家的人儿,都在忙些什么”,觉得很是可爱。据说,这俳句作于元禄四年,其时芭蕉因病卧床,未能参与大坂商人为之举行的俳句会,故以此语作答。看来这表面的恬淡,其实也有着微微的凄凉,尤其“深秋”二字,谓其颇有《文心雕龙》“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之感,想必不会有大差错。而今不惟深秋,且霜降了,并又吹着寒风下着冷雨,我不得不独自且落寞地守在房间里头,心思散漫,兴味淡寡,无心读书,只得兀自地临窗枯坐着发呆。将近秋末,窗外的花差不多已凋残,只剩下金桂花与粉籽花了。而桂香浮动于黄昏,难在白昼赏心,惟墙角的那一簇粉籽花稍可悦目。

粉籽花乃土话,本名为紫茉莉,“本不甚高,但婆娑而蔓衍易生。叶似蔓菁,秋深开花,似茉莉而色红紫。清晨放花,午后即敛,其艳不久,而香亦不及茉莉,故不为世重”。固然此花为世所轻,却颇得乡野间孩童喜爱,或将其萼片轻缓拉出而不使断,倒悬于耳后以为珰,或将花瓣和矾石少许捣碎,遍敷于指甲间以为染,或将四五六朵从茎内以细线串在一起,环挂于项上以为链。据奥成达、永田晴美《实用游戏图鉴》,另有一种“化妆擦粉游戏”,即“把黑色的种子弄开,然后把种子里面的白色粉状物涂在脸上,就好像母亲化妆时扑粉一样”,清人曾源昌诗“好施村女颊,长傍野人家。结子偏含粉,妆成夕照斜”,便是就此而言。然而我的母亲早不在了,模仿起来,徒具其形,也就甚无谓了。

呆看许久,回神过来,粉籽花已萎了,对着那无歇止的雨水兼更沉郁的天色,愈索莫了,只好继续去读此前搁下的书,是周作人所译《枕草子》,其中“叹息朝颜花的荣华不长”云云,说的虽然是牵牛花,却也使人“更觉得惋惜无可譬喻了”。



《金陵卖书记》更关注“启蒙的生意”

◎苗斋

清末上海四马路上也有一家开明书店。除从事印刷发行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代理销售各类新书。1902年,书店经营者之一夏清贻赴南京“赶考售书”,自称“播文明之种子”,随后以“公奴”之名出版《金陵卖书记》。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输入文明者校准其方针,下卷则以示社会之现状焉”。

清末的新政给图书市场带来巨商大贾,可据夏清贻的观察,重开的

科考仍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也”。在他看来,购书的多少关系到“文明之命运”和“文化之将开”。“盖销书之数,即输入文明之数”。由此可见,相对于经济效益,该贩书者更重视文化传播,或者说,更关注“启蒙的生意”。

1903年,开明书店另一名经营者王维泰也乘开封科考之际前去售书。他挂起“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广开风气,输出文明”的招牌,并效仿夏清贻

撰写《汴梁卖书记》。原书分“记卖书”“记游历”“记交际”三卷。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里收录这两部卖书记,但以与书业无关为由,删掉了《汴梁卖书记》中“记游历”的后半部分和“记交际”的全部。今人王之江新编《金陵卖书记及其他》,又将两书全文收录。对照阅读可知,《汴梁卖书记》不仅文笔不如《金陵卖书记》,书籍文化史或曰书籍社会史之价值更是远不及也。